

和平發展觀察

2015 年第 5 期（总第 5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5 年 10 月 27 日

对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几点认识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2012 年底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以来，日本安全政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化。2013 年，日本发布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基调的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和新《防卫大纲》，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局。2014 年，日本内阁修改了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2015 年 4 月，日美时隔近 20 年发表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武器出口三原则也开始解禁。2015 年 5 月中旬在横滨举行 1945

年以来首次防卫装备展。安倍内阁还实现了连续三年增加防卫费。最具标志意义的是，2015年5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对日本安全保障法案进行大幅修改。9月1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安保法案，意味着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新安保法案通过制定“恒久法”改变了过去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需要临时立法在时间上的限制；通过废止《周边事态法》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制。考虑到日本与中国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且安倍政权推动修法过程，处处将所谓“中国威胁”作为国际大背景，日本安全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不能不引起中国高度重视和关切。如何认识日本在安全政策上扎实迈向“正常国家化”的发展趋势，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重大现实课题。

安倍内阁政治倾向不是决定性因素

表面上看，传统的“右倾化-军国主义复活”逻辑看上去很有说服力，似乎也很容易从日本社会反对安倍内阁“强行通过”安保立法国会审议的热潮中找到证据。例如，8月30日，日本国会前12万人参加反对安保法案游行示威；参议院表决前夜，国会外大批民众冒雨示威游行；日本各大媒体的舆论调查都显示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声浪高于支持者，日本广播放送协会(NHK)在今年4月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比例仅为22%，回答不支持为30%。

但实际上，这种直线式判断远不能反映日本国内真实情况。日本安全政策的“正常化”不仅仅是以安倍政权为代表的日本政

治右倾保守主义、历史“修正主义”（revisionism）不断发酵的结果，也不仅是安倍外祖父岸信介的家族继承性的政治倾向所致，而是日本国内整体心态的反映。安倍并非冒巨大政治风险“强行通过”法案，日本社会和执政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呈现“背离”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民众-政治精英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方向性分歧，只是对于实现方式和节奏未形成共识。同样以 NHK 的舆论调查为例，2007 年的调查显示回答“通过修改宪法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 23%，“通过宪法解释改变可以使用集体自卫权”为 28%，意味对集体自卫权持肯定态度达到了 51%。换言之，日本国民过半数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2013 年调查显示，上述两个回答的比例分别为 29%和 19%，这意味着持肯定态度为 48%，远高于回答不应该解禁的 26%。说明至少到 2013 年为止，日本政治精英与民众在安保政策改革上是“趋同”（convergence）而非现在表现出的“背离”（divergence）。变化发生在 2014 年。去年日本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前 NHK 的调查显示，上述两个回答的比例分别为 21%和 13%，这意味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持肯定态度从 48%减少为 34%，反对比例增加到 41%。如何解读日本上述民意前后矛盾的现象？反映了日本人并非完全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本身，而是反对政府解禁的方式和速度。今年的调查中有 61%认为政府没有对安保法案作出足够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希望重新定义日本国家认同的大目标上，政治家和国民是一致的，只不过以什么方式以及以什么速度没有形成共识。

其次，从日本政治精英内部来看同样没有方向性分歧，在野党表面上反对得很热闹，但实际上内部意见分裂。作为最大在野党的日本民主党在安保问题上并没有统一意见。前首相野田、原外长前原等保守派民主党议员对于行使集体自卫权持积极态度，而那些从原来社会党并入民主党的议员则反对。为避免党内分裂公开化，民主党采取偷换概念的战术，即回避讨论日本需要什么样的安保政策，而把焦点放在自民党提出的安保法案违反宪法程序性问题上。并把所有的精力都置于追究“违宪论”上。反过来说，即使民主党执政同样也会朝着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方向行进，只不过方式和速度会很不一样，所以这里不存在路线上的根本冲突。要看到这一点才能够把握好日本发展的内在动态。同样，公开反对安保法案的知识精英当中，不少是长期主张修改宪法甚至修改第9条的学者。他们同样把重点放在集体自卫权解禁违反宪法上。安倍政府正是看到反对势力实质上的脆弱，从而判断即使一时间支持率下跌，但过后等民众习惯了，热情就会消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强行通过”安保法案从战术上说是成功的。

日本国家认同再定义与安全政策演变

二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经历再造、陷入矛盾又面临重塑的过程，引领相关安全政策发生演变。

第一阶段，日本战败后放弃了战前追求军事大国的国家认同，重新定义战后日本新的国家认同，即“美国的盟国”和“经济大国”。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东亚冷战降临，《旧金山和约》不仅拉

开日本全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序幕，也标志着“美国的盟国”的战后日本政治层面国家认同的开始。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敏锐地察觉到在日美同盟的政治框架下专心发展经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以安全上依靠日美同盟专心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重新定义战后日本新国家认同的两大主要内容，即“美国的盟国”加上“经济大国”。这个新认同在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逐渐被全社会所接受，7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得到进一步巩固。国际上，日本的新国家认同也被美国默认。日本的安全政策最初主要建立在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交换美国保障日本安全承诺这一机制上。70年代末期略有变化，日本开始向美国提供“温馨预算”（日本为驻日美军承担部分财政负担），但基本框架在冷战时期没有大变化。冷战中，日本可以说几乎生活在日美同盟的“温室”中，既不需要认真研究国际形势，也没有构建自主国际战略的必要性，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没有发布过防卫大纲和防卫白皮书。

第二阶段，冷战时期“吉田主义”有效地帮助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内生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原中曾根首相的顾问佐藤诚三郎曾指出，由于选择了“吉田主义”的“彻底的经济优先”路线，“日本也因此失去了左右国际政治的基本框架的大国地位”。“美国的盟国”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位长期以来回避了日本国家认同政治层面再定义的关键问题，即日本在国际政治中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回答，或者说是“政治认同缺位”。

尽管不希望再次成为军事大国，但无论日本精英还是国民的潜意识中仍然保留着希望成为国际政治中有影响力国家的心理需求，并期待经济大国的地位会自然带来政治大国认同的到来。

第三阶段，冷战后，上述“吉田主义”的“政治认同缺位”的内在矛盾开始表面化，日本重新定义国家认同的课题出现。主要表现为四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是，尽管对海湾战争提供了 130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日本却没有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感谢，这让日本人意识到经济大国并不会自然带来国际地位和世界尊重。日本国内开始热烈讨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担负起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代表人物小泽一郎提出，日本应当担负与经济地位相适应国际贡献的“正常国家论”，日本的安全政策的讨论也随之变得活跃。1992 年，自卫队首次被派遣到海外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仅仅为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拉开了帷幕而已。第二次冲击是，90 年代中期出现的朝鲜核危机对日本的安全观念产生了现实的挑战，进入了所谓的“不情愿的现实主义”（reluctant realism）或者是“务实现实主义”（pragmatic realism），日本原有的不参与军事安全合作的绝对和平主义受到很大挑战，结果是日美制订了新的防卫指针。第三次冲击是“911 恐怖袭击”，日本通过特别措施法对美军提供后方补给援助，并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第四次冲击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直接挑战日本的“美国的盟国”政治认同的脆弱性。

近年来，两个“意外的”外部因素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国民。一是发生在突尼斯的涉日恐怖袭击事件以及“伊斯兰国”日本人质砍头事件等暴露了日本在情报收集、安全合作方面上的无力。

无论政治、知识精英还是民众都感到需要对安全保障和国际战略重新审视，也认识到日本需要在国际安全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2010年中日经济地位逆转，日本经济实力相对衰落挑战着“吉田主义”国家认同的经济部分，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感。

第四阶段，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在安全政策上进行一系列改革，试图从正面开启重构日本“国家认同”的进程。安倍晋三的改革实际上体现了日本整体寻找“后吉田主义”时代新的国家认同的期待和焦躁的交融。透过现象看本质，日本安保政策修改，集体自卫权解禁实质上仅为日本寻找新国家认同的一种载体而已。而在这个国家认同再定义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渲泄对象”。过去15年，中日关系由于靖国神社参拜、领土冲突、安全政策等出现很大的波动，从日本角度来分析这都是其在重新定义自身国家认同带来的冲击波。

日本的悖论与国家认同重构前景

然而，上述变化并不意味着日本原有的“吉田主义”核心国家认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是处于重要的变动期。

一是日本民众“悖论”心态会影响政府推进“正常国家”进程。在希望日本在国际上扮演什么样角色问题上，日本似乎充满着悖论，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上：一方面民众希望日本发挥更大国际作用，另一方面却反对政府推进安保法案的改革的方式；一方面民众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对日挑战，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宣

传“中国威胁论”并不完全信服；一方面在领土问题上民族主义似乎不断高涨，但另一方面国民的传统国家观念却在不断弱化。例如日本共同社5月18日报道，总部位于瑞士苏黎世的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公布一项国际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是否愿意为国而战”这一问题，参加调查的64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以11%排名倒数第一，而中国为71%、俄罗斯为59%、美国为44%、韩国为42%。安倍首相不厌其烦地向国民说明新安保法案的重要性，但说服日本国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似乎越解释民众的怀疑越加深。日本的政治精英与民众存在着方向性上的“趋同”可能会被保守政治精英利用，加上中国崛起的新的背景推进向传统大国方向的正常化进程，但是在具体内容和推进方式上的“背离”则让上述可能性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这涉及到日本新的国家认同重建的本质问题。

二是日本民众“后现代主义”心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军事大国倾向。日本民众一方面认识到日本需要在世界事务上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保持国际影响力，但不认为日本应当承担类似中美那样大国的作用，更不希望卷入美国的纷争，也就是说政治大国可以通过非军事化方式实现。很多日本人认为作为发达国家需要的不是像新兴国家那样追求进一步的发展和富裕，而是需要朝着更加舒适精致，以及为“后现代国家”提供模板的方向发展，例如在老人社会服务，环保节能等方面找到新的自豪感，来代替原有的经济大国的认同。如果日本的新的国家认同能够顺利向这个方向发展将更多的是“吉田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否定。对于民众来说希望未来的日本可能是军事上来说不错的国家

(not bad military power), 经济上来说还将会是大国之一 (one of the leading economies), 软势力上努力成为出色的国家 (excellent soft-power)。有人说战后英国成功地实现了优雅的衰落 (graceful decline), 那么日本从经济大国向“后现代国家”转型成功的话将可能是优雅衰落和华丽转身 (splendid transition) 的结合, 这本身将会抑制军事大国倾向最为有效的保障。

“正常心态” 从容面对日本的“正常化”

对于中国来说, 如何面对一个日益“正常化”的日本是一个大课题, 但需要放在日本国家认同转型、日美同盟发展、中国崛起的大框架下来进行多重观察, 既不麻痹, 也不过度反应。以正常心态面对日本的“正常国家化”。

第一, 牵制日本正常化走偏、失的最大力量是日本国民和美国。 尽管日本部分保守精英对于传统的大国认同恋恋不舍, 但这与民众追求的新国家认同有较大差距。日本国民对于日美同盟的支持率高达将近 90%, 日本要想成为完全的完整的军事大国需要突破日美安保体制。脱离美国, 这在目前来说不可想象, 完全没有民意基础, 有限的正常国家是比较可能的道路。日美安保新指针强调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提高日本防卫能力, 同时也进一步有利于美国管理日本。上述安保立法改革都是美国多年来要求日本做的事情, 并非脱离日美安保体制。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对于日本经济来说也不大可能的, 防卫开支的大幅度增加将会

意味着社会福利减少，这对于目前日本财政来说不仅不现实，而且会损害政府的执政合法性。

第二，中国崛起是中国从容面对日本正常化的信心基础。在大势上，中国处于上升，日本相对下降的趋势意味着中国有能力对失控的日本正常化采取必要的阻断手段。

第三，中国需对日保持接触、疏导，推动日本向于我有利方向转型。长期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帮助日本实现国家认同从傅高义当年的畅销书中所写的“日本第一”（Number One）的传统大国认同向“日本唯一”（Only One）的后现代国家认同的转变。这就要求中国采取对日“接触政策”（engagement），主要靠疏导而不是堵的办法。接触的主体要从原来的政府、政治家向民间和民众偏重，接触的内容则要从原来的政治经济向社会、环境等非政治的功能性领域侧重。但是，“接触”并不等于“迁就”，更不等同于“放纵”。在领土主权，历史认识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要坚决主张中国的立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与此同时，在日本不挑战底线的前提下，政府接触层面要努力维持“正常的工作关系”，为在将来日本国内政治真正准备好的情况下发展中日关系积蓄正能量和构建可持续的沟通管道。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中国对日外交实践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积极的进展，例如日本安保安局长访华达成4点原则共识基础上中日恢复了首脑会谈。2015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纪念抗战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前再次接待日本安保安局长到访，10月份杨洁篪国务委员访问日本，为中日韩三边首脑会晤作准备。

日本的“正常化”是不是“真的狼来了”是一个开放性的问

题，可以坏也可以不坏甚至可能部分可以为我所用，其最后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认同的再定义是否成功，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以“正常心态”，自信而富于艺术的引导。

（责任编辑：刘昆仑）

稿约

《和平发展观察》与大家见面了。

她既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以内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发展观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5.10.27